

※ 序跋選錄 ※

《日本江戶時代《論語》學之研究》 導言

張文朝*

本書收錄的論文，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研究室（以下簡稱本室）於二〇一五年一月至同年十二月透過「研究群」讀書會方式，敦請在臺日本學者及研究日本文化等相關領域的中國、臺灣學者，精讀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所得成果。這些學術論文曾發表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十日，由本室舉辦的「日本江戶時期《論語》學之研究」學術研討會。

《論語》於日本第十五代天皇應神天皇十六年(285)由百濟五經博士王仁傳到日本，其後遂為政府所採用，更在律令時代成為大學寮明經道在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春秋左傳》等七經之外，必須兼習的讀本之一。到江戶時代研究《論語》的學者近三百人，相關著作有四百種以上。在日本儒學各大派重要的《論語》著作中，例如朱子學派林羅山(1583-1657)的《論語解》、《論語摘語》；敬義學派淺見綱齋(1652-1711)的《論語筆記》；陽明學派中江藤樹(1608-1648)的《論語鄉黨啟蒙翼傳》、《論語解》；古義學派伊藤仁齋(1627-1705)的《論語古義》；古文辭學派荻生徂徠(1666-1728)的《論語徵》、《論語辨書》；折衷學派井上金峨(1732-1784)的《論語集說》；考證學派大田錦城(1765-1825)的《論語大疏》、《論語名義考》、《論語作者考》、《論語聞書》等等，都是值得世人研究、關注的著作。

本書所收論文，就時代而言，大致跨越了江戶時代前、中、後三期的日本學者《論語》學研究成果。江戶時代前期有關雅泉的〈林鷺峰的《論語》詮釋：以

* 張文朝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。

《論語集注私考》為中心)¹，此文以林鷺峰(1618-1680)《論語集注私考》為中心，從《論語》的涵義、《論語》的編纂、孔子的身世等三部分的解釋，分析鷺峰對明代著作抱持的看法和態度。林鷺峰的註解大量引用明代著作，這是該書比較特殊之處。寫作目的不在批評，而在增廣自己的學識，使得自己的學術有別於折衷新、古注的清原家。此文以「學而時習之」章、「其為人也孝弟」章、「吾與回言終日」章，以及「子入大廟」章為例，對照朱熹《論語集注》，分析鷺峰《論語》解釋的特徵。因而有助於明代著作在江戶時代前期的傳播情況，以及中日之間對朱熹《論語集注》的詮釋情形，還有江戶時代《論語》學的研究等等的了解，均具有深化作用。

江戶時代中期則收錄探討荻生徂徠、太宰春臺(1680-1747)、中井竹山(1730-1804)、中井履軒(1732-1817)等四位學者《論語》學的論文。論及荻生徂徠的有十一篇，與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相關的論文有八篇，這些論文除可作為本室「精讀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」讀書會的實際成果外，亦可察知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為現代學界重視的程度。如趙熠璋的〈《論語徵》中所見「古言」、「古語」典據考〉，整理出《論語徵》的「古言」、「古語」分布情況，其中「古言」見於六十五章九十五處，「古語」出現於十六章十八處；依據的典籍主要為六經、《論》、《孟》和《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，最終探討徵引這些典據的合理性。此文從語意的角度分析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的「古言」、「古語」，雖然只是荻生徂徠「古文辭」學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可以用來觀察荻生徂徠所謂「古文辭」所涉的範圍，當有助於理解荻生徂徠批判朱熹、伊藤仁齋《論語》學的優劣得失。

張崑將〈荻生徂徠對〈子罕〉篇首章引發的詮釋爭議〉一文，以中日歷來爭議不已的「子罕言」章為論述對象，將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」分成：(1)「八字連讀，三事罕言」：主張此說者，如中國學者皇侃、朱子、顧炎武；日本學者伊藤仁齋、藍澤南城、龜井南冥、片山兼山等。(2)「八字斷句，一事罕言」：主張此說者，如中國學者史繩祖、康有為、牟宗三、錢穆、劉述先；日本學者荻生徂徠、太宰春臺、皆川淇園等。(3)「八字連言，一事罕言」：主張此說者，如中國學者焦循。此文認為荻生徂徠首先提出「利必與命與仁並言」的解釋，且其「八字斷句，一事罕言」乃針對宋儒而提出，具有鮮明的學術立場，同時還探討其後引發德川後儒的認

¹ 集注的「注」或「註」字皆依原作者所錄。

同與批判，形成獨特詮釋言說等的影響。此一研究除可理解荻生徂徠及後學對此章的獨特解釋外，並可以讓讀者體會「同中有異」與「異中有同」的詮釋多元性與複雜性。

有別於前兩篇論文，或考究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中的古文、古語，或詮釋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的篇章，藤井倫明〈荻生徂徠思想中之「道」與「德」：透過其「仁」說所作之探討〉一文，則以荻生徂徠的核心思想「仁」為探討重點，論述徂徠「道」論中「仁」概念的意義及徂徠「仁」觀的特色，同時闡明徂徠思想內「道」與「德」的關係。此文認為先王、聖人制作禮樂刑政以為安民之道；後世君王或據「道」以安民，或學「道」成德、成材，行仁政以安民；士人則學「道」成德、成材，輔君安民；民（農工商）則學「道」，各自成德、成材，「相養、相輔、相成」，亦可達到安民之目的。此文的貢獻在於，提出欲了解徂徠思想中的「道」與「德」的關係，必須將聖人（先王）的境界與凡人的境界分開理解的觀點。亦即認為在聖人的境界，「仁德」是制作「安民之道（禮樂）」的前提，德居道之上位；在凡人的境界，則須學「道」才能成「德」、成「材」，德居道之下位。然而，徂徠的「道」論不能離開其「德」論，只有將「道」與「德」兩者合在一起，才能真正理解徂徠的「道」論。

張文朝〈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中所見《詩經》觀〉一文，分成：徂徠之淫詩觀、《詩》教觀、人情觀、《詩》與言之關係、徂徠《詩》學意義等項，探討徂徠《論語徵》的《詩》觀，進而分析中日學者詮釋之異同，同時論述古文辭學派學者對徂徠觀點之繼承與修正。此文先分析徂徠的淫詩觀，認為徂徠採取鄭聲不等同於〈鄭風〉的態度，以批評朱熹之謬。其次透過對「思無邪」及「溫柔敦厚」的詮解，提出徂徠之《詩》教觀著重各人「隨心所欲」之說，以批判朱熹「性情之正」之誤。再次討論徂徠之「《詩》悉人情」觀，以批判朱熹「《詩》本人情」觀之誤。接著指出，徂徠主張學《詩》之「言」，可以使自己「能言」、「知言」，甚至可以「知賢人」，以為政府所用。最後指出徂徠《詩》觀為《論語徵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。蓋徂徠批判朱子學與仁齋學同為空虛妄說之心性理學，不知先王之道乃在禮樂制度，提出透過讀通六經之古文辭，以知先王之道。徂徠透過對朱熹與仁齋的批判，在學問上取得重大的收穫，古文辭學派因而成為當時的學術主流。一般認為，徂徠在其著作中，多言《詩》與當今詩歌、日本和歌無異，頗有去經化的傾向。但在《論語徵》中卻明顯視《詩》為經的性質，透過本文的論證，將有助於更深入的

了解徂徠對《詩》的態度。

以上論文從不同角度分析、詮釋、理解徂徠的《論語徵》。陳威璿的〈中井竹山《非徵》的徂徠學批判及其意義〉，則探討懷德堂朱子學派學者中井竹山《非徵》對徂徠採取的批判態度。此文歸納竹山所謂徂徠剽竊他人之說、解經不一致、執著於固定字義、未能動搖朱子學的詮釋、徂徠思想具有缺陷等等的問題；以及竹山認為徂徠的最大問題在好立新解、強自為說，以求名求勝等的缺點。接著此文論述《非徵》批判徂徠學的意義，認為《非徵》的思想史意義在於，竹山所處的大坂町人環境需要的是，可以從庶民角度提供町人環境所需之修養資源的學說；而不是徂徠學所主張的由士來養民，因此種主張在庶民階級中無法真正被實踐，反而容易合理化為人情的過度放縱。所以竹山要捍衛朱子學，而對抗徂徠後學的學風，保障町人社群所需的教化素養。此文詳細論述中井竹山《非徵》批判徂徠《論語徵》之不是。讀者透過中井竹山對徂徠學的批評，可以想像江戶時代更多的學派互動情形，描繪出更豐富的義理比較空間與歷史圖像，進而對東亞儒學的開展有新的認識。

藍弘岳〈徂徠學的重構：太宰春臺的「聖人之道」與日本批判〉一文，認為春臺的學問規模非常接近徂徠，春臺的重要著作大多可看到徂徠的影子；他一方面繼承徂徠的思想，一方面透過重構徂徠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學問。討論身為荻生徂徠弟子的太宰春臺以為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「孔氏遺文」，是理解「六經」中「聖人之道」的重要書籍。同時討論了徂徠與春臺在思想史上的繼承與差異；春臺重視「孔氏遺文」及孔安國對此等經書的注釋，比徂徠更願意信任留有許多「孔門傳授之說」的漢代書籍。接著透過對「道」與「性」、孝與君臣秩序、孝與宗族制度的討論，理解春臺的「聖人之道」論。最後並透過春臺《經濟錄》有關葬禮、祭禮的討論，檢討春臺批判日本禮制的缺乏；認為「聖人之道」重「孝」，故當主土葬，而非日本佛教主導的火葬；主張包括人君在內，都應親祭祖先，不該將祭祀之事委於僧侶，而以佛教儀式行之。此文認為，春臺雖然肯定德川的封建體制，但主張要強化統治體制，當採用、參考中國的喪服制度、宗廟制度等與「孝」之實踐相關的諸種制度，並從此觀點批判現狀。此文著重於太宰春臺的「聖人之道」，從日本禮制的檢討與批判，以重構徂徠學的內涵；有助於理解太宰春臺的儒學思想，與德川時代古文辭學派內部的傳承與發展。

田世民〈批判性繼承朱子學的《論語》解釋：論中井履軒《論語逢原》對朱子

《集註》之批判與評論的意義》一文，探討履軒揭櫫「據朱子《集註》」立場的意義，更著墨於《論語逢原》與履軒其他經解間的關係。此文認為，履軒實有意「批判性繼承」朱子的《集註》，以建立平穩的《論語》解釋；此一面向似乎為前賢所忽略。此文首先探討履軒《逢原》對《集註》諸說的批判，如批判朱熹文外生義之解，或援卮言以入註解、註解有舉業之臭及耦對之崇；而履軒也以各種評語批判朱熹的註解及引用諸說的不當，從而突顯了履軒的解經立場。其次，考察《逢原》對《集註》形上議論的看法及評論，探究履軒有意批判性繼承程、朱之說，並企求著實平穩解釋《論語》，以見聖賢氣象的立場。反對朱熹以「心之德」解「仁」，認同孟子「性善」、「擴充」之論，並主張孝悌及仁均應落實在人的行為上，進而擴充善性以成德。復次，討論履軒偶以淺近之喻詮釋經文及評論《集註》之表現，履軒雖強調解經必須依經作解，但更多了一種貼近讀者的親切感，展現出一種深入品評經文，而又不失活潑的解經形態。此種註解方法乃是履軒解釋《論語》的一大特徵。最後，從江戶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履軒《論語》解釋的意義，履軒認為唯有透過批判性的眼光檢視朱子《集註》，並加以補充修正，始能對《論語》達到平實而完整的理解。此說有別於荻生徂徠對朱子《集註》「批判而棄之」的態度，這是一種秉持「批判而繼之」的立場。總之，這是一部貼近有心精讀《論語》本文的學者設想，因而以淺顯不俗的文字，詮釋理解孔門語錄的著作。由此文可得知，江戶時代中期，關西大阪地方的懷德堂學者，對朱熹《集註》所採取「雖然批判卻繼承之」的態度，有別於關東江戶地方「欲去之而後快」的學風。

江戶時代後期，收錄討論市野光彥(1765-1826)、帆足萬里(1778-1852)、安井息軒(1799-1876)、林良齋(1807-1849)等《論語》學的論文。金原泰介的〈試探市野光彥《正平本論語札記》中對俗字的校勘〉，關注市野光彥《正平本論語札記》對俗字的校勘，進而探討其特色、學術背景、學術史上的定位等基本問題。作者為釐清《札記》之內容，於是舉吉田漢官(1745-1798)的《論語集解考異》與狩谷望之(1775-1835)的《和名類聚抄箋註》為比較對象，考察市野與二學者之學術關係。作者指出，市野雖受吉田之影響而關注俗字，但市野的俗字考辨則是受清代考據學的影響；市野的清代考據學，卻是受狩谷之影響。就俗字的研究而言，日本有些學者已關注了江戶時代的俗字研究與清代考據學之關係，但諸說過於簡略，無法明證影響的有無。通過此文，可以肯定江戶時代的俗字研究確有受清代考據學影響之實，而且是從狩谷望之為領導的學者群體中，開始明顯起來，《札記》是很具體

的例證。此外，還透過分析市野光彥《正平本論語札記》根據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五經正字》、《干祿字書》等而證實「正平本」乃六朝版本；對於了解域外日本的《論語》版本內容，具有重大意義。有助於了解日本對《論語》版本中俗字流傳的複雜情況。

工藤卓司的〈帆足萬里《論語標註》的解經特色〉，先說明帆足萬里的學術生平，再針對萬里《論語標註》與朱熹、伊藤仁齋、荻生徂徠及中井履軒等的《論語》解釋進行比較。認為：(1) 萬里一方面高度評價朱熹在儒教史上的貢獻，但否定程朱學以「理」為核心的詮釋系統；另一方面指出朱熹雖本於道德，明於性命，但主張「持敬主靜、體用」等諸說，非孔子時所有。(2) 萬里主張以古文解古經，解釋上多與徂徠、履軒相同；但在思想上更接近仁齋古義學。(3) 萬里雖未接納徂徠對「禮」的解釋，但在教育思想方面，多受徂徠啟發。最後探討萬里《標註》解經的方法，認為除藉由上述比較，已可略見一斑外，另有：萬里解釋《標註》常以日本的風土歷史為例；萬里精通於西方學術，偶有引以為解；萬里《標註》已具備一種歷史考證的意識等等。透過此文，可以了解江戶時代後期學者帆足萬里的《論語》學特徵，以及其解釋與朱熹《論語集注》、伊藤仁齋《論語古義》、荻生徂徠《論語徵》、中井履軒《論語逢原》等的異同，還有受西洋學問、蘭學、印度等影響的多樣性。

眾所周知，日本明治時代(1868-1912)開始大量編輯《漢文大系》之類的大部頭叢書，所選對象多為江戶時期學者的著作，或以日文旁譯，或以日文再譯。如服部宇之吉(1867-1939)編纂《漢文大系》時，即選擇江戶時代後期學者安井息軒《論語集說》為《論語》的底本。服部為了讀者的方便，在各頁「天頭」附加日文「標註」，且說：「『標註』必定根據安井息軒先師之說記述。」但是，遭受松本豐多(1848?-?)激烈指責「標註」並沒有都採納息軒之說。青山大介的〈安井息軒《論語集說》與服部宇之吉「標註」之間的齟齬：以松本豐多《四書辨妄》為線索〉，正是以松本豐多《四書辨妄》對服部宇之吉「標註」息軒《論語集說》的指責為線索，分析息軒和服部之間的齟齬，並探討息軒《論語集說》的本質。此文認為，息軒在經典解釋上有：以復原漢代原文為目標，修改經文；考慮《論語》整體的整合性，解釋一條章句時參考其他章句，考慮經典全面的整合性，解釋《論語》時參考其他經書；將孔子視為歷史上之實在人物，考慮當時的人情世事、習俗文化、禮樂制度等特點。在思想上有：需求外在規範，將經書視為人倫道德之

「法」；重視「與別人的對峙」，將《論語》視為「政治論」之書；同時將孔子「聖人化」（神化），以孔子為具有完美特質的理想人物等特點。透過此文可以看出，江戶時代後期的安井息軒與明治時代後期的服部宇之吉對《論語》的看法，因時代學風的改變而有所出入，兩者賦予了《論語》不同時代的特質；息軒視《論語》為政治書，宇之吉則視為修養書。正如作者在結語所說：「兩者的《論語》解釋也如實反映著社會的趨勢或氣氛。」

鍋島亞朱華〈日本幕末陽明學者的《論語》詮釋：以林良齋《論語學徵》為例〉一文，藉由林良齋對《論語》的詮釋，突顯江戶幕末陽明學除實際參與勤王倒幕運動的行動派外，亦有重視讀書與沉思的道德實踐派。林良齋年少時學習朱子學，二十八歲成為陽明學者大鹽中齋的弟子。作者認為，林良齋詮釋《論語學徵》時，較少直接用自己的語言註釋，而是積極引用朱熹的《論語集注》、明儒之說、大鹽中齋的見解。徵引的目的即是為了增強自身學說的權威性，並以先賢的語言驗證自己的思想，進而指出良知心學並非異端，而是正統思想。註釋的背後思想，則是受到明末「新陽明學」影響的觀點。其學問主旨為「以無我為宗，以慎獨為功」，反映出明末學術的特色；此特色亦反映在其經典註解。此文探究江戶時代後期陽明學者註解《論語》的不同視角，除可察知明代學術影響日本詮釋經典外，又可藉此了解東亞經學詮釋的多元性。

以上江戶時代前、中、後三期各篇論文，都與朱子學有所關連。除江戶朱子學派的林鷺峰、大阪懷德堂朱子學派的中井竹山外，即使是反對朱子學的古文辭學派學者荻生徂徠、太宰春臺，或者積極引用朱熹《論語集注》的陽明學派林良齋，或是對朱子學採取寬容態度的古注學派（一說考證學派）安井息軒、標舉採取朱子《集注》立場的古注學派中井履軒，或否定朱子以「理」為核心的朱子學者帆足萬里，或先信奉朱子學後改為考據學的市野光彥等，都在《論語》相關著作中，或贊朱，或反朱，以朱說為論述的對象。這也說明，朱子學在江戶時代的學術中，是無法跳過的存在。就地區而言，有江戶（東京）的鷺峰、徂徠、春臺、光彥；大阪的竹山、履軒二兄弟；四國的良齋；九州的萬里、息軒，大致已包含了當時各地區的重要學者。在此人、時、空交織而出的《論語》學研究成果，當可為後學者提供某些可以更加深入研究的議題。

綜觀本書呈現的研究成果，可大致了解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對中國《論語》學的研究情況；除漢、宋外，對明代朱子學也有不少的關注，同時還有透過清代考

證學研究《論語》學，且取得亮眼的研究成績。更重要的是，已經有學者結合歐美等學術，從事中國經學的再解釋；此股勢力直接影響江戶時代之後的明治政府及學界，遂有日本明治維新之誕生。

本室舉辦的「日本江戶時期《論語》學之研究」學術研討會，與會學者提供了十二篇研讀日本《論語》學成果的學術論文，期望有助於讀者了解江戶時代《論語》學在日本各地區學者的接受、傳承、修正、轉化，以及對明治時代《論語》學影響的實際情況。這同時也是編輯此書的目的所在。